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1, No. 2, 2025, pp.171-182.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2.01>



“他者”文化与文学的深度阐释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注释研究

陈淑梅 (Chen Shumei), 任 会 (Ren Hui)

摘要: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为《聊斋志异》译本所作的注释丰富、详细、深入, 注重联系与扩展, 注重当下性, 具有指引性、导向性。通过注释, 翟理斯客观全面地解释了中国文化现象, 揭示了文本中包含的言外之意、情理逻辑及故事主旨。翟理斯的注释是“深度翻译”的典型样本, 对于西方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聊斋故事及中国文化、纠正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现今面向外国学习者的《聊斋志异》教学乃至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翟理斯; 《聊斋志异选》; 注释; 深度翻译

作者简介: 陈淑梅 (通讯作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19世纪中西语言、文化、文学接触,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 chenshm@mail.sysu.edu.cn。

任会, 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国际教育方向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电邮: annie.renhui3@gmail.com。

Titl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Other”: Research on Annotation in 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bstract: The annotations made by Giles for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re rich, detailed and in-depth, emphasizing connection and expans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China, with guidance and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annotations, Giles obj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ains the Chinese cultural phenomena, reveals the implied meaning, logic and the story themes contained in the text. Giles’s annotation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deep

transl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western readers to accurately and deeply understand Liaozhai stories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correct stereotypes about China. Besides, these annotations are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teaching of Liaozhai stories for foreign learners and even to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nnotation; thick translation

Author Biography: **Chen Shumei**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 in the 19th centur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chenshm@mail.sysu.edu.cn. **Ren Hui**, Master’s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Research: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E-mail: annie.renhui3@gmail.com.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研究以往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不无启示意义。除了译文的正文以外，作为“副文本”要素之一，注释对于作品的接受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注释为著名汉学家在中文作品的译本中所添加且体量庞大时，其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译《聊斋志异选》。

在早期中国文学西传史上，《聊斋志异》受到众多来华西人青睐。自 1842 年起，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阿连璧（Clement F. R. Allen）等就开始陆续翻译聊斋故事，1880 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出版《聊斋志异选》，将《聊斋志异》在西方的译介推向高潮。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注释数量多，注释内容广泛，每则故事的注释数量从 1 到 17 个不等，短者一二行，长者一二十行（最长 31 行），全部注释共计 658 条。乔媛（2015）等学者不同程度地对翟译本注释进行了研究，但大多只略举数例。孙轶旻（2007）将《聊斋志异选》注释分为七类，较其他人的研究更为详细，但是其分类存在交叉现象，且未能涵盖所有注释。

总之，前人虽有所研究，但由于注释本身过于庞杂及分类标准欠妥等原因，现有研究并不全面，也欠深入。本文采取更为科学合理文化分类框架，对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文化注释进行定量统计及定性分析，并对以往研究者忽略的有关故事内容的注释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更为准确地呈现《聊斋志异选》注释的整体面貌和特点。

翟译《聊斋志异选》注释同时也是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一个典型样本。所谓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宋晓春，2014，p.939）注释是深度翻译最常见的体现方式。本文将在全面分析翟理斯各类注释的基础上，揭示其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深度再现，总结其注释特点，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翟理斯及《聊斋志异选》注释

翟理斯于 1867 年自英国来到北京，作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开始学习汉语，随后被派往天津、宁波、厦门、上海、台湾地区等地从事外交工作。1893 年退休后返回英国，接替威妥玛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在中国期间及回国后，他出版了多部汉语教材和词典，如《汉言无师自明》《字学举隅》《语学举隅》《华英字典》等，此外还撰写了多部汉学著作，如《古今姓氏族谱》《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宗教》《耀山笔记》等，并翻译了《三字经》《千字文》《佛国记》《聊斋志异》《庄子》等著作以及大量中国古代散文、诗歌、笑话乃至中国古代画论。他在汉学研究领域涉猎广泛，成就巨大，两次被法兰西学院授予儒莲奖，并获得皇家亚洲文会的学会金奖，晚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海外通讯院士（王绍祥，2004）。

1880 年，翟理斯依据但明伦评注版并参照余集序版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 164 个故事，以“*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通常译为《聊斋志异选》）为名在伦敦结集出版。1908 年该书在上海出版第二版，第三版及之后的版本皆以此为蓝本（葛桂录，2017, p.103）。本文研究的《聊斋志异选》为 1916 年在伦敦发行的第三版。

在该译本引言中，翟理斯说自己的翻译是“对中国民俗知识的补充，以及有关那个庞大帝国的礼仪习俗和社会生活的指南”（Herbert A. Giles, 1916, P. xxiii）。实际上，除了他所说的“民俗知识”“礼仪习俗”“社会生活”等广义的文化内容外，注释中还包括很多对故事情节内容的解释说明。经统计，有关中国文化因素的注释共有 509 条，占主要部分；对情节内容的解释、概括、评论等方面的注释共 149 条，虽然数量不如前者多，但同样值得研究。

二、《聊斋志异选》文化类注释情况

本文参考“国际汉语教材文化点分类框架”（周小兵等，2019）对文化注释进行归类。该分类框架将文化项目划分为中国国情、成就文化、日常生活和习俗、交际活动和思想观念等五类一层文化点，下含二层和三层文化点，层次分明，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依据此框架，“嫦娥：传说中活跃于公元前 2500 年的首领后羿的美丽妻子。据说，她从她的丈夫那儿偷了长生不老药，然后带着药逃到了月球上。”¹可归为“成就文化——文学——神话传说及故事”，再如“公子无须亲迎”的注释：“新郎通常把新娘从她父亲家里接出来，用一张漂亮的、镀金的、四面封闭的红色轿子把她送到他家，轿旁伴有一支乐队。”归入“日常生活与习俗——人生庆典——婚礼”。根据以上标准，在对 509 条文化注释进行辨析归类之后，得出下表：

文化项目类别	中国国情	日常生活及习俗	思想观念	成就文化	交际活动
数量（条）	173	123	110	83	20

表 2-1 《聊斋志异选》文化注释一级文化项目分类情况表

Table 2-1 Classification of First-level Cultural Items in the Cultural Annotations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¹原文为英文，本文中所有注释均为笔者自译。

由上表可见，在一层文化项目中，中国国情类注释最多，其次为日常生活及习俗类，再次为思想观念类、成就文化类，交际活动类最少。

在中国国情类注释中，按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政治和法律>人民>家庭>社会阶层与地位>教育>地理>其他。政治和法律方面介绍了御史台、吏部等政府机构，禁私盐等法律规定，掳掠、凌迟等刑罚种类。“人民”类大多与族群职业有关，如穷书生、媒人、乞丐、乐户、报骑等。“家庭”类多涉及婚恋生育和家庭成员关系，如表亲联姻、改嫁、入赘、收养子女的规矩、休妻的理由、遗产的继承等，同时翟理斯也能够敏感地注意到隐含在文本背景中的观念，如《珊瑚》中对“兄弟隔院居”的注释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状态。”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观念显然是特别的。“社会阶层与地位”类较多介绍了与官员相关的情况，如官员的仪仗、薪酬、职责、等级等。由于聊斋中较多科举故事，在“教育”类注释中翟理斯对很多关于“科举”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如秀才、举人等称呼、考试方式、科举舞弊等。此外，翟理斯特别注意到中国的师生关系，在注释中指出“师生之间的恩情仅次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恩情”（《大男》），专门就此进行说明，也能看出译者眼中这一现象的独特性。“地理”类涉及到水体如洞庭湖、扬子江，以及白牡丹、麋等动植物。翟理斯还专门对中国的狗进行了注释：“中国的狗通常是一种营养不良、狂吠不止的杂种狗，性格上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作为房屋和财产的守护者，这种动物的社会地位与我们的不同，它的名字本身就是责骂的代名词。”（《义犬》）透过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把中国狗的样貌品类、和西方狗的地位差别、“狗”字本身包含的责骂意义呈现出来，当然，其中不无对中国狗的偏见。

日常生活和习俗类的注释中，与人生庆典有关的最多，其次为禁忌迷信与象征、休闲娱乐与健康、材料与生活器具、饮食及习俗，其他类别都较少。人生庆典绝大部分与婚礼葬礼有关，如婚礼仪式、嫁妆、婚后归宁、棺材、服孝期、纸钱等。如对“寄柩寺中”（《鲁公女》），注释写道：“这是中国各地非常普遍的习俗。”使可能认为奇怪的西方读者了解这一习俗在中国的普遍性。“禁忌迷信与象征”类大多为仪式或行为，如招魂、算命、占卜等。“休闲娱乐与健康”类涉及打猎、下棋、划拳、骰子、斗蟋蟀等。关于女人骑马，注释说：“在中国，女人两腿分开骑马。”（《戏缢》）显然，注释背后隐含了中西对比。在当时的欧洲，为了显示优雅，女性骑马是侧骑，两腿都在马身的一侧。从异文化的视角出发，翟理斯使外国读者注意到中国女性骑马方式的特别之处。“材料与生活器具”类包括漏壶、柅、窗、洗衣石等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物品。“饮食及习俗”类中，翟理斯用英国人熟悉的芦笋来介绍笋，“笋：煮熟了是芦笋很好的替代品。”（《聂小倩》）在与酒有关的注释中，翟理斯特别点出了中国的饮酒习惯：“总是热饮。”（《田子成》）暗含了与西方饮酒习惯——冷饮的对比。居住方面，在“榻”的注释中翟理斯介描述道：“北方的榻是砖床（“brick beds”），下面有个炉子加热，上面铺一个垫子。上面通常还有一张矮桌子和两个枕头。中国人喜欢斜靠在床上，让酒壶、鸦片烟斗或茶壶都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身旁还有一位可以聊到深夜的朋友。”（《跳神》）由北方的炕延伸到中国人日常的生活状态，寥寥数笔，极有画面感。此外，他还注意到女性房间：“女性的房间与中国住宅的其他部分非常隔离，因此男性访客对其居住者一无所知。”（《胡氏》）

思想观念类注释绝大部分跟宗教信仰有关，其中又以民间信仰占大多数，其次为佛教与道教。《聊斋》为鬼狐故事，因此并不奇怪，翟理斯的注释涉及了大量的地狱、鬼怪等方面的内容，如阴间与阳世，“刀山”“鬼使”“投生”、沟通人间和阴间的“走无常者”等。通过这些注释，翟理

斯为外国读者描绘出一个完整的阴间世界系统。还有一些注释有关宿命与福祸观，如“生死已定”：“对宿命的坚信是中国人头脑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都是命’是帝国里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日常挂在嘴里的一句话。”这一注释有助于使外国读者了解在中国人中“宿命观”的普遍性。关于佛教的注释涉及到方方面面，如佛教器具（拂尘、木鱼、瓢杖等）、佛教经典、规则（禁酒、禁肉）、仪式等，一些注释中包含了对佛教的负面评价，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佛教徒的虚伪：“中国的佛教信徒毫不犹豫地为了食物而杀生，又一次次地通过购买鸟、鱼等放生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并希望这样的行为会被记录在他们善恶簿上好的方面。”关于道教的注释较佛教为少，涉及到道教神仙、修炼、用具等，突出了其神异色彩。除了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类注释中还有一些涉及到中国人的空间观。如由“四海”一词，翟理斯解释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中国人认为‘四海’限定了地球上适宜居住的部分，顺便说一下，他们认为地球是方形的。中国在一切的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即宇宙之眼，中央王国。在离她的海岸很远的地方，有许多小岛，住着英国、法国、荷兰等野蛮民族。”这种描述出自英国汉学家之口，不无调侃意味。翟理斯还不止一次对“风水”做了注释，并进行了评论：“这种迷信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不难理解伪科学的风水先生对公众思想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姊妹易嫁》）显然，翟理斯并不认同中国的风水观念。

在成就文化类注释中，占比最多的为语言文字和文学，特别是惯用表达。对于这些惯用表达，翟理斯往往采用直译方法来翻译，然后加以注释。如将“将就木焉”译为“shall be drawing near the wood（将靠近木头）”，注释为：“一个非常古老的表达，表示‘坟墓’，‘木’指‘棺材’。”将“茅舍无烟”译为“smokeless hut（无烟的棚屋）”，注释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表示没有食物。”这种注释方式，不但使读者了解特定表达的字面意思，突出了表达形式的特别之处，也有助于使读者了解隐含意义，从而跨越阅读障碍。文学方面的注释多与传说故事有关，如嫦娥的故事、湘妃竹的传说、汉皋解佩的故事等。此外，翟理斯不止一次对对联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个“中国文人很喜爱的消遣方式”（《莲花公主》），他无奈地承认：“要翻译出一副中国对联真正的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仍然突出对联最重要的特点——对仗：“第二行每一个词在声调和含义上都要与第一行中同一位置的词相对。”（《苗生》）

交际类文化类注释主要涉及交际情景规范，如送礼收礼、做客待客、问候寒暄、就餐、称谓等。《寒月芙蕖》中道士回请那些常邀他吃饭的缙绅们，翟理斯在注释中说：“接受邀请而没有尽早还人情被认为是严重违反了中国的礼节。”《王六郎》中对“六郎珍重！勿劳远涉”的注释是：“这是客人对礼貌地送他到门口的主人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餐方面，翟理斯注释了“覆盞”：“一个人不想再喝酒时惯有的信号。”（《陈云栖》）解释了“相并杂坐”的意思：“不考虑地位高低。”并进一步说明了宾客座次：“在中国人的宴会上和在西方宴会上地位高低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最尊贵的客人坐在桌子的上端，主人坐在桌子的下端。”（《苗生》）还在注释中介绍了中国人对饮酒的看法：“世界上最冷静清醒的人（酗酒很少在他们当中出现）认为在所有的节日场合都愉快地喝醉，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而是一种值得称赞的事。”（《狐嫁女》）这些注释表现出翟理斯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于中国社交规范的敏感，也透露出他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及性情的细致观察。

总之，翟理斯为《聊斋志异选》做的文化注释广泛、具体而详细，为异域阅读者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日常生活、交际规范以及独具特点的习惯表达等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的信息。此外，通过他

的注释，作为文本背景的一些隐而未显的东西，如中国人关于婚恋、家庭方面的观念、宗教信仰状况、普遍流行的鬼怪观念、宿命观等等得以呈现出来，为西方读者所认知。

三、《聊斋志异选》故事内容注释情况

除了文化类注释外，翟理斯还对情节内容进行了注释，这类注释共 149 条，主要可分为解释具体内容、评论故事内容、总结故事主旨、相关扩展引申等几个方面。

（一）对具体内容的解释

有关故事内容的注释中超过一半为对具体内容的解释。这些解释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的针对语句，也有的针对情理逻辑、鬼神变化等等。聊斋故事中一些语句有特定的隐含义，如《阿纤》中，三郎的堂弟探望表亲时，得知堂嫂阿纤住在近旁，就去敲门，阿纤隔门问是谁，并说：“我家故无男子。”翟理斯在这里加注道：“意思是说他不可能进去。”解释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婴宁》中王子服携婴宁离开时走了很远，回头时仍见婴宁养母“倚门北望”，此处翟理斯注释说“悲伤地在后边看着他们”，解释了“倚门北望”这个姿势所传达的情感内涵。《续黄粱》中曾某被抄家，“充云南军”，翟理斯将这句话翻译成“驱逐到云南”，并加注释：“历时约三个月的陆地旅行，最后到达一个一直被中国人认为半野蛮的地区。”以使读者明白“到云南”的惩罚意味。这些语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言自明，但外国读者则很可能因不了解其含义而忽略信息，导致对所读内容一知半解。翟理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有可能成为阅读障碍或“阅读迷雾”之处并将其注释出来，为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意提供了帮助。

还有一些注释与人物行为背后的情理逻辑有关。如《尸变》中，四个车夫中三人被女尸害死，只余一人幸存，这人对县官说：“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来的，现在我一人回去，怎么能让乡亲们相信我呢？”于是“宰与之牒，赍送以归”，翟理斯注释道：“如果没有这种证明（牒），那些不友好的邻居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和烦恼。”说明“与之牒”的缘故。《跳神》中“妇厉声呼翁姑及夫嫂小字”，翟理斯注释说：“除了帝王、父母、祖父母等，其他人不能喊男人的名字。因此，只用一家之主的字就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某位祖先的灵魂一定被召来了。”从情理的角度使读者明白“呼翁姑及夫嫂小字”所隐含的意思。《促织》中成名之子一年后精神复原，“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翟理斯注释道：“也就是说，在暂时的精神错乱时期，他的灵魂进入了蟋蟀的身体，让父亲抓住了自己，并使蟋蟀以非凡的活力战斗，以弥补他粗心大意放跑另一只蟋蟀所造成的损失。”这一注释使读者明白成名之子变成蟋蟀的前后因果。

聊斋故事都与离魂、附体、鬼神变化相关，这些奇异变化对于不熟悉此类故事的外国读者来说，有可能造成困惑。翟理斯对此做了大量注释。如《珠儿》中，被妖僧所害又受其驱使的詹姓鬼娃附在死去的珠儿身体上，使珠儿死而复生，醒后说：“昔从妖僧时，有儿等二人……”翟理斯注释道：“在这里提醒一下读者也许是必要的：是詹的灵魂在通过珠儿的身体讲话。”这一提示避免了读者阅读时可能会产生的误解或混淆。《邑人》中无赖乡人早起被两人摄去，身与猪肉相合，屠人操刀割肉，无赖乡人痛彻骨髓，“肉尽方寻途归；归时日已向辰。家人谓其晏起”，翟理斯注释道：“只有他的灵魂离开了房间。”使读者明白他的身体一直在房间，魂归时方起床。《寒月芙蕖》中观察公因为道士把他的家藏美酒变出来给别人喝，恼怒之下叫人用棍子打道士，结果“杖才加，公觉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虽声嘶阶下……”，翟理斯注释道：“当然只是假装受伤，杖责

的痛楚被他用法术转移到了观察公的背上。”使读者明白道士被打而观察公觉得“暴痛”是因为道士使用了法术的力量。

通过这些注释，小说中对读者来说可能存在的理解障碍得以消除，具有隐含意义的语句、人物行为背后的情理逻辑以及鬼神变化的原委被清晰呈现出来，变得清楚明白。

（二）对故事内容的评论

除了解释故事中的具体内容外，翟理斯还常常通过注释做出自己的评价。如《莲香》中，莲香说“世有不害人之狐，断无不害人之鬼”，翟理斯评论说：“莲香小姐在这里没有根据地说，这在后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故事后续的发展显示，本身为鬼的李女却并无害人之意，翟理斯的评论对于读者有保留地看待莲香的断言起到了提示作用。《八大王》中冯生的妻子见了想嫁给冯生的三公主后，公主很喜欢她，两人于是结为姊妹，注释写道：“这种解决婚姻困难的方法在中国小说中很常见，但我得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此处翟理斯直接现身提醒读者，防止读者由小说形成泛化印象。再如《婴宁》中王子服对婴宁说：“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婴宁问：“有以异乎？”王子服说：“夜共枕席耳。”翟理斯对此评论道：“这一幕应该会永远改变人们认为中国人之间没有‘示爱’的观点。”借助小说中的情景打破人们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总之，在对情节内容的各种评论中，翟理斯致力于避免读者对内容的误解、预防对中国的偏见或刻板印象的形成，从而引导读者对故事内容、对中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三）总结故事主旨

翟理斯常在注释中简单地进行总结，以使读者明白故事主旨。如关于《席方平》：“整个故事当然只是对中国统治阶级贪赃枉法、不讲公正的讽刺。”《王十》“是对极不公正的盐税的讽刺”，《颠道人》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对那些趾高气扬的贵族的讽刺，如果没有专属他们等级的全部随从，他们甚至不能去野餐”。《布商》的最后，翟理斯点出了使布商摆脱生命危险的秘密：“当然，佛像保护那些照顾他在世间利益的品德高尚的生命。”在《酒虫》的注释中，翟理斯还引用点评者但明伦的话来说明主旨：“点评者想让我们相信对于刘先生来说，对酒的喜爱是健康和快乐的元素，而不是一种亟待治疗的疾病。”

受到自身文化、社会语境、文学素养等的影响，西方读者在阅读中有可能对故事主题与中心思想产生理解偏差，通过这些注释，翟理斯帮助读者把握作者写作故事的意图与目的、正确理解故事，同时对于读者的价值判断也起到了引导作用。

（四）进行相关扩展

除了对故事本身内容的解释、评论或总结之外，翟理斯在注释中还常进行引申和扩展，表现之一是类似情节的中外联系。如《画壁》中朱孝廉被壁画中天女吸引，随之“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翟理斯注释道：“这无疑会让读者想起《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画皮》中道士将鬼斩杀后，拿出葫芦将鬼化成的浓烟全部吸进葫芦中，翟理斯注释说：“这使人回想起《天方夜谭》中那个著名的渔夫的故事。”此外，翟理斯还在一些注释中补充了类似的中国故事，如《贾奉雉》中贾科场不利求仙不成、回家后已过百年，翟理斯在注释中讲述了“烂柯”的典故以及《艺苑》中记载的遇仙故事。《西僧》讲述了两个西域来的和尚叙述所历艰险，翟理斯在注释中说这些内容让人想起“法显在公元5世纪早期从中国到印度的著名的旅行故事”。通过这些注释，翟理斯引导读者关注中外作品或同类作品之间的相似性，从而更好地理解聊斋故事。

总之，在故事内容类注释中，作为一个来自异域的译者，翟理斯扮演了一个“过来人”与引路者的角色。他基于西方读者在阅读时所可能遇到的理解困难或理解偏差选取注释点，并以阐释、评论等方式在恰当的地方予以提示和指引，将那些容易误读或忽略的内容解释明白，并将那些对于母语阅读者来说不言自明的意蕴揭示出来。此外，还通过相似的故事或情节在中西文学之间建立联系，使西方读者消除陌生感。

四、《聊斋志异选》注释特点

翟理斯对《聊斋志异选》所做的注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释内容丰富、详细、深入。《聊斋志异选》的注释涵盖政治法律、思想观念、婚丧习惯、饮食、生活器具、动植物、语言表达、情节内容等方方面面，极为广泛。在很多注释中，翟理斯都不是简单地一带而过，而是详加描述，如关于“撈掠”，注释首先说“在中国这是一种常用的鞭打犯人的方式”，很可能有人对此注释的处理就到此为止了，但翟理斯还继续介绍了所使用的工具——“由一条刨平的竹片组成”，种类——“严格地说，有重、轻两类，前一类现在几乎不被使用了”，被打的部位——“在康熙统治之前，所有棒打的地方都是背部。但是这位仁慈的皇帝把处罚的位置降低了，‘以免伤到肝脏或肺部’”。再如关于嫁妆，注释写道：“中国的嫁妆除了衣服和珠宝外，还包括桌椅、各种家具和装饰品。”（《胡氏》）对于想了解中国嫁妆包括哪些东西的西方读者来说，这是具体而有用的信息。再如对穷书生的注释：“他们羞于经商，也没有足够的事业心去开始医生或占卜者的职业生涯。除了画画、画扇和给书配插图之外，这些书生还用各种风格写花哨的对联，这些对联深受中国人的青睐。他们也为人记账，为不识字的人们读、写商业信件和私人信件。”详细介绍了穷书生所可能从事的职业、谋生的方式。对于榻、当铺、算命、官员仪仗等的解释都是如此，充满细节的丰富性。

不仅如此，翟理斯在注释中还常常结合阶层差异、地区差异、性别差异等进行多方面的具体描绘，如介绍窗时不但详细描述样式材质，而且指出了地区差异：“覆以半透明纸的木框窗户在中国北方各省广泛使用。在南方，牡蛎壳被切成方形、刨成薄片，以瓦片的样式镶入木框中狭长的空处，两者用途一样。”介绍婚前是否见面时指出不同阶层的情况：“他们本应该在结婚日前不见面的，但是经过仔细的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十之七八，准新郎会偷偷地见他未来的妻子。我现在说的是更高层次的阶级。在穷人中间，两性几乎和我们一样自由地交往。”（《阿宝》）关于宴会的注释则指出女性与男性分开招待的事实：“女士们在‘里屋’或后宅里为不同客人的妻子们提供单独的娱乐活动”，同时指出例外：“然而在中国，歌女出席并分享浪荡子们的宴会。”这种多角度的介绍有助于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更全面、更充分。

在表层的文化现象之外，翟理斯也非常重视深层的文化观念。如前所述，《聊斋志异选》中有很多专门针对思想观念的注释，涉及到中国人的鬼神观、福祸观、宿命观、空间观、风水观等，除此之外，即使是小说中不经意的一个词或一句话，翟理斯也往往会通过注释指出其中包含的或与之相关的观念。如对于“贵胄”一词，翟理斯解释了贵族地位在中国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说明“财富与这个问题无关，无论合起来看还是单看，官衔和文学品位都构成了一个人在同伴心目中的地位。贸易被看作是不光彩的、卑鄙的，而且商人和官员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友好交往非常罕见，几乎不为人知。”（《阿宝》）联系财富、官衔、文学品位等说明中国人心目中的高低贵贱观念。在

《姊妹易嫁》中翟理斯为“恐福薄人难承荷耳”加了如下注释：“每个人能吸收的只有确定数量的好运，而不能多吸收，任何过多的运气都会给接受好运的人带来实际的伤害。”解释了中国人认为福气也有定数的观念，对于“我为君易慧心”（《陆判》）翟理斯加注说：“中国人至今仍然相信，心是智慧和情感之所。”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翟理斯对隐含在文本语境中的文化观念的敏感和重视。通过他的注释，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故事，也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

第二、注重联系与延展。在注释中翟理斯往往并不局限于解释某一文化点本身，而是常常联系到相关的其他文化内容。最常见的是进行中外联系与对比，如对握手进行注释时说：“虽然中国人不像我们对‘握手’这个词的理解那样去握手，但是，抓住一个离别或归来的朋友的手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注意到了中西差异，也呈现了中国人的“握手”表现的情感内涵。再如关于“上梁”的注释说：“这相当于我们的奠基仪式，不一样的是一个庆祝一座新建筑的开工，另一个是庆祝它的完工。”注释“拜天地”时翟理斯说：“在中国的婚礼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相当于我们的‘在礼拜室签字’。”（《罗刹海市》）此外，还会引导读者注意中外相似故事，如在《画壁》的注释中翟理斯将朱孝廉被吸引到壁上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相联系，《画皮》的注释中由道士将鬼化成的浓烟全部吸进葫芦联想到《天方夜谭》中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翟理斯在陌生文化与西方读者的既有认知之间建立了联系，使他们更容易理解与接受“异域”文化。

从某一文化内容延伸到另一相关文化内容，这是翟理斯注释的一大特点。如在对中国人的“字”进行注释时，翟理斯由中国人的姓名、妇女的姓氏扩展到猫狗的名字（“狗、猫被叫作‘黑’‘白’‘黄’‘宝’‘珍珠’等”）、船的名字（“帆船以‘大利’‘大富’‘幸运儿’等命名”）以及地名（“地方通常以一些显著的地理特征命名，例如，汉口——‘汉水的河口’……也有一些特别的字，比如福建——‘幸福地建立’……”）。读者在阅读该注释后，对中国人的姓名以及其他事物的命名方式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再如在介绍骰子时说中国骰子幺点和四点涂了红色，由此讲到与唐玄宗有关的典故，然后说“所有的信件、急件和类似的文件，上面总有些红色，红色是幸运的颜色，对中国人来说也是繁荣和欢乐的象征。”（《田子成》）由骰子延伸到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此外，翟理斯在注释中也会延伸到相关语言表达，如注释“内寝”时，翟理斯说：“家里的女人住的地方，任何陌生人都不能进入。在中国丈夫对妻子的称呼中，一个很常见的称呼就是‘内人/内子’。”解释“月老”时，翟理斯引用了令狐策与冰下人语的典故，最后说“常用词语‘作冰’，就是去安排一桩婚事。”总之，延展式注释使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更为广泛、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注释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第三、注重“当下性”。翟理斯在解释文化现象时，往往并不囿于小说背景，而是常引入中国的当下现实。如在对“窗”的注释中谈到玻璃在当时广州富裕家庭的使用：“玻璃逐渐进入了富人的家庭，在广州，大量的玻璃被制造并输送到帝国的各个地方。”在对“报骑”的注释中翟理斯介绍了该职业在以前的情况，紧接着介绍了现实中的情形：“但是现在电报机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工作。”在介绍裹脚习俗后说：“现在，一场为中国女孩争取天足的有力尝试正在进行，很可能成功。”对“斗鹌鹑”进行注释时翟理斯说：“斗鹌鹑在中国不像曾经那样常见了。然而，斗蟋蟀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赌博形式，每年都有大量的蟋蟀因此被捕捉，而且人们常常把相当多的钱押在冠军之争的结果上。”（《王成》）没有对斗鹌鹑进行更多解释，而是把重点放在已取而代之的“斗

蟋蟀”上，使读者了解正流行的（而不是过去常见的）娱乐形式。翟理斯以其身在中国的优势，及时向读者传达了中国最新的最真实的情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

翟理斯还常常在注释中引入个人真实经验，如《西湖主》中，陈生落难走入山中，来到一个院子，“因疑地近闺阁，恒怯未敢入”，翟理斯由此谈到靠近女人住所时轻声咳嗽（提醒里边的人及时离开门窗而不被察觉）的礼节，并描写了自己实际遇到的情景：“在多次拜访各个级别的官员时，我都听到从某个位置传来女士衣裙沙沙作响的声音……”在注释“占卜”时，翟理斯叙述了自己在厦门一座道观的亲身经历，对乩卜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突然，旋转的动作停下了，仪器的尖端在沙里快速勾画出一个汉字，几位旁观者立即辨认出这个字，一位负责的文书马上把这个字抄下来……”这些现实经验成为“当下的”中国的最好的注脚。

第四、具有指引性、导向性。在关于故事内容的注释中，翟理斯能够于细微处捕捉到影响读者理解的语句，通过注释为读者提供正确的含义并提炼出故事主旨，帮助读者形成清晰的正确理解，避免误解或混淆。此外，他还常常通过注释纠正人们既有的或可能有的对中国的不准确的想象或偏见。如关于吃猫肉狗肉，他在注释中指出：“据说广州市有几家‘猫狗’餐厅，但是这类食物的食用远没有人们平常想象的那么普遍。”说明早在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认为中国人吃猫狗的普遍看法，翟理斯则指出事实与想象的差距。在介绍了男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不同之后，翟理斯专门指出：“但是，从这一点并不能推断出女人在中国的地位低，事实远非如此。每个母亲在祖先祭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母亲的名字与她丈夫的名字并列地记录在墓碑上。”避免读者对中国的男女地位进行简单化、绝对化的判断。关于对犯人用刑，翟理斯注释说：“中国官员偶尔诉诸酷刑是不争的事实，只有那些没有机会发现或不想发现实际真相的人会断言，全体官员普遍地运用酷刑。”既承认了酷刑的存在，也强调了这一现象的偶然性，指出认为酷刑普遍存在的看法不符合事实。《八大王》中冯生的妻子与想嫁给冯生的三公主结为姊妹，翟理斯在注释中提醒读者说：“这种解决婚姻困难的方法在中国小说中很常见，但我得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这些注释如同岔路上的路标，指引读者走向正确的理解方向，同时防止关于中国的偏颇印象的形成。

五、结语

在《聊斋志异选》的 509 条中国文化类注释中，翟理斯对中国国情、日常生活与习俗、思想观念、成就文化和交际活动等进行了注释，涉及政治法律、族群职业、家庭婚姻、婚葬习俗、休闲娱乐方式、饮食、节日节气、宗教信仰、汉语的惯用表达及传说故事、交际情景规范等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为读者理解小说中的文化背景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翟理斯的文化注释鲜明地体现了深度翻译的特点。有研究者指出，“深度翻译”的“深度”表现为“深度描写文学作品背景（或语境）”“认识其他各个文化和各时代特有的行为原因”以及“尊重他者”（黄小芑，2014）。“深度翻译的要点是特别注重细节、语境和阐释”“深度翻译是一种异化翻译。”（黄小芑，2014）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对于聊斋故事所涉及的文化内容，翟理斯并不是简单地平面化地进行注释，而是客观、全面地进行多角度的详细描述，并常常以延伸与扩展等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系统性，使读者由作品深入到作品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而加深对聊斋故事及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通过揭示作品背后所蕴含的家庭、宗教、禁忌、空间、鬼神、福祸等方面的观念，使读者明白作品中人物特有的“行为原因”。此外，翟理斯

还特别注重呈现“当下”中国实情，注重以细致的观察和实际经验的描述纠正刻板印象及流行看法，并以异化翻译方式突出汉语惯用表达的独特性，致力于使读者了解“真实的”“异质的”中国，体现出他对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

深度翻译不止表现在文化注释上，也同样表现在作品内容注释上。在 149 条关于故事内容的注释中，翟理斯或对具有隐含义的语句、内容背后的情理逻辑、鬼神变化等进行解释，或对某些情节内容进行评论，或总结故事主题思想，为读者正确、深入地理解故事、把握主旨提供了帮助。借用冰山理论，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如饮食、服饰、居所等是显露于海平面之上的内容，而更多的支撑并决定显性文化的内容如价值观、信仰等则隐藏在海平面之下。同样，在文学作品中，表面的字句、篇章之下也隐含着大量的母语者习以为常的言外之意、情理逻辑、文化观念，这些，正如海平面之下的文化内容一样，潜在而无形，对非母语阅读者的理解造成决定性影响。翟理斯注释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不但对于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度阐释，而且将文本中这些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内容揭示了出来，作品展现出面向异域读者的不同向度与丰富内涵。

总之，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注释在促进西方读者理解聊斋故事及中国文化、帮助读者跨越文化障碍及文学障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受西方强势殖民文化的影响，翟理斯的注释不无局限性（如对佛教与风水的微词、对中国狗的负面评价），但总体而言，他能够客观看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注释中对之进行了深度再现，体现了对“他者”文化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尊重。此外，他还在注释中对中外文化与文学进行联系、对比，体现出开阔的视野及跨文化的阐释意识。即使在今天，其注释方式对于面向外国学习者的《聊斋志异》教学乃至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也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 Shum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7107-5752>

Ren Hu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5336-0607>

References

- 葛桂录编（2017）：《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力、霍克斯》，大象出版社。
[Ge Guilu(ed.) (2017). *Chronologies of Three Leading British Sinologists: Herbert Giles, Arthur Waley, and David Hawkes*. Elephant Press.]
- Herbert, A. Giles (1916).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 Werner Laurie LTD.
- 黄小芄（2014）：“再论深度翻译的理论和方法”，《外语研究》（02）：72-76。
[Huang Xiaopeng (2014).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ick Translation Agai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2):72-76.]
- 乔媛（2015）：“处处思虑 守得月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之改写与注释”，《东方翻译》（06）：55-61。
[Qiao Yuan (2015). “The Rewriting and Annotation of Herbert Giles’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06): 55-61.]
- 宋晓春（2014）：“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外语教学与研究》（06）：939-948。

[Song Xiaochun (2014). "Thick Transla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6):939-948.]

孙秩旻（2007）：“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明清小说研究》（02）：228-237。

[Sun Yimin (2007). "The Reception of the Notes and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y Herbert Giles." *The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02): 228-237.]

周小兵、谢爽、徐霄鹰（2019）：“基于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的中华文化项目表开发”，《华文教学与研究》（01）：50-73。

[Zhou Xiaobing, Xie Shuang, Xu Xiaoying (2019). "Developing a Corpus-based Chinese Cultural Content Item List for TCSOL." *TCSOL Studies* (01):50-73.]